

专访夏衍年度荣誉电影剧本编剧： 做时代浪潮中的“扎根者” 在时代的胶卷上书写“灵魂底片”

■文/本报记者 赵丽

在首届夏衍电影编剧周暨第十九届“夏衍杯”优秀电影剧本评选中,“夏衍年度荣誉电影剧本”榜单日前正式揭晓——《长安三万里》《第二十条》《封神第一部:朝歌风云》获2023—2024夏衍年度荣誉原创电影剧本,《三大队》《封神第一部:朝歌风云》获2023—2024夏衍年度荣誉改编电影剧本,四部长片以不同维度的创作实践,标注了中国电影剧本创作的高光坐标。

这份聚焦“生长之力、破界之光、时代之碑”的荣誉名单,藏着中国电影穿越周期、抵达观众内心的终极密码——“好的剧本,永远是让观众在别人的故事里,看见自己的影子,照见时代的光。”从法治题材的尺度平衡到传统文化历史IP的现代解构,从类型融合的大胆尝试到现实议题的细腻刻画,这些荣誉作品折射出中国编剧行业的探索与突围:在市场浪潮与技术变革中,坚守“故事的本质是对人性的观照”。

近日,本报专访了荣获首届夏衍年度荣誉电影剧本的创作者,与他们一同深入探寻荣誉剧本背后的创作灵感、故事架构以及对电影行业的深远影响。



◎ 从《封神第一部:朝歌风云》到“夏衍杯”,编剧冉平解码新时代电影剧本的“破圈之道”

2023年暑期档,《封神第一部:朝歌风云》如同夏日热浪般席卷而来。该片以其宏大的叙事、精巧的改编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,引发了一场现象级的观影热潮。视听盛宴的背后,隐藏着编剧团队的匠心独运。魔幻电影不仅是形式上的创新,更是情感表达的舞台。

作为《封神第一部》的编剧,冉平坦言“让传统文化与当代观众频频共振”是核心出发点。他表示,创作初期首要任务是确定主题——“何谓英雄”,并以此构建叙事策略:“我们希望打破历史与玄幻小说中对‘英雄’的固有定义,通过人物关系的重构,让年轻观众产生情感共鸣。”

从《封神第一部》的传统重构到夏衍

杯的行业启示,冉平的分享折射出中国电影编剧的时代转型:在传统与现代、艺术与市场、个人情怀与社会价值之间,寻找兼具思想深度与传播力度的平衡点。正如他所言:“编剧的工作,从来不止于写一个故事,而是通过故事思考我们是谁、我们如何与世界相处——这,才是电影最动人的力量。”

在传统与创新中寻找当代共鸣

在人物塑造上,团队大胆突破传统认知。例如,将历史中“荒淫无度的昏君”纣王塑造成“有魅力的坏人”,突出其勇敢无畏的行为方式,以此映射对“英雄”内涵的辩证思考;同时虚构姬发作为

质子在朝歌的经历,构建起姬发与纣王、姬昌与殷郊两对父子关系,辅以年轻人的友情线,形成影片的叙事骨架。

冉平透露,创作过程中曾针对90后、00后观众做调研,发现多数人未通读过《封神演义》原著,而是通过通俗影视作品了解姬、姜子牙等符号化形象。这一发现为创作松绑:“观众对原著没有固定期待,反而让我们能更自由地从当代视角重新诠释故事,聚焦英雄定义、父子关系、原生家庭等现代议题。”

在姬己与纣王的关系处理上,团队摒弃了传统“情色与荒淫”的标签化表达,转而赋予二者“相互利用的利益共生”关系——姬己为生存依赖纣王的血复活,纣王则借姬己的力量巩固权力。“这种改编剥离了迂腐的旧叙事,让人物关系更贴近现代观众对‘利益与合作’的认知。”

“夏衍杯”:从“文学性”到“市场性”,编剧地位的时代跃升

作为创作者,冉平对“夏衍杯”这一荣誉的行业价值感慨颇深。他回忆,2006年首次获得夏衍杯时,评选更侧重“电影文学剧本的文学性”,而首届“夏衍年度荣誉电影剧本”评选则突破性地聚焦市场与观众反馈:“这次获奖的《封神第一部:朝歌风云》《三大队》《第二十条》《长安三万里》,涵盖历史、现实、动画等多元类型题材,但共同特点是市场反响

正向,得到了观众的认可。”

在他看来,这一变化标志着行业对编剧价值的重新认知:“过去编剧常被视为导演的附属,负责技术性完成故事;如今奖项直接奖励‘从原点出发’的创作者,意味着编剧需要在选题、主题、叙事策略上更早介入对观众、市场、产业的思考。”

冉平表示,夏衍杯的导向性在于“让编剧从‘讲好故事’转向‘思考故事’”:“《长安三万里》关联当下教育与文化趋势,《三大队》创新警察形象刻画,这些成功案例证明,编剧的初心不应局限于个人情怀,而要立足时代语境,思考故事与现实的连接点。这对青年编剧是极大的鼓舞——你的创作从一开始就被行业看见、被市场需要。”

编剧的使命:在类型化与本土化之间寻找破局点

面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多元化发展,冉平为编剧创作提出方向:“既要吃透类型,又不被类型束缚,用中国文化与现实经验赋予类型新内涵。”

在他看来,年轻观众阅片量激增,对好莱坞类型片套路耳熟能详,单纯模仿难以突围:“唯有扎根本土,将类型化叙事与中国人的情感结构、文化传统、现实困惑结合,才能让观众产生‘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’的共鸣。”例如《封神第一部》虽为魔幻题材,内核却围绕“父子关

系”“身份认同”等传统伦理议题展开,《长安三万里》则通过诗词串联历史与当下,让传统文化以鲜活的方式触达观众。

谈及行业未来,冉平呼吁加强编剧的专业性培养:“电影编剧比电视剧更难,因篇幅限制需在有限时间内完成高密度的人物塑造与叙事推进,且市场反馈即时性强,观众对故事逻辑、情感真实度要求极高。”他建议,编剧需深入研究社会现实、传统文化与产业规律,在类型框架内追求“新鲜、有趣、动人”的创新:“既要掌握类型片的叙事技巧,又要注入中国独有的人文内核,让故事既有市场影响力,又能传递社会价值。”

创作初心:从“打开窗户”到“扎根现实”

回顾此次获得夏衍年度荣誉电影剧本的感受,冉平用“打开一扇窗”形容:“相较于早年聚焦文学性的评选,这次奖项从市场反推创作原点,让编剧感受到自己的工作被置于产业前端,而非后端的技术环节。这种认可不仅是荣誉,更是责任——提醒我们创作要对得起观众、对得起时代。”

展望未来,他透露将聚焦现实题材:“想做与普通日常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的故事,让观众在银幕上看到自己的影子。如果能同时获得市场正向反馈,便是对‘讲好中国故事’的最好诠释。”



◎ 编剧张冀谈《三大队》创作:在现实与时代中挖掘人性力量

电影《三大队》的诞生,源于一段跨越12年的追凶传奇。编剧张冀在谈及创作初衷时透露,这部作品改编自深蓝(前刑警)的非虚构小说《三大队报告:局长,三大队任务完成》。“第一次读到小说时,我被双重量击——既有个人命运的跌宕,也有时代变迁的烙印。”他提到,主人公程兵(原型人物)在身为警察时坚守职责,因过失犯罪入狱后仍以平民身份执着追凶,这种“身份转变中的不

变信念”极具张力,“不同于常规刑侦题材,它更聚焦‘人’与‘时代’的关系——司法改革的进步、警察职业的精神内核,都藏在这个故事里。”

张冀坦言,吸引他的不仅是“12年追凶”的热血,更是人物在困境中的选择:“当一个人失去职业身份,甚至遭遇命运重创,却依然保有对正义的信仰,这种真实的人性光芒最动人。”他认为,《三大队》的独特性在于“以小见大”——通过

个体命运折射中国司法系统的发展,同时展现刑警群体“脱下警服仍是守护者”的职业底色。

扎根生活的创作密码:让角色“落地生根”

在人物塑造上,张冀秉持“从现实中来,到细节中去”的原则。为了让程兵、徐一舟等角色立体鲜活,他深入基层调

研:“我去了派出所、刑警队,观察警察的工作流程、生活状态,甚至翻阅卷宗,了解案件侦破的真实逻辑。”他发现,现实中的警察并非单一的“英雄符号”:“有人喜欢吹笛子,有人穿着便衣像‘老板’,年轻刑警热血冲动,老刑警则理性沉稳——他们既是执法者,也是会去菜市场买菜的父亲、丈夫,这种‘烟火气’是角色的灵魂。”

此外,张冀还从身边从事警察、医生

等职业的亲友身上汲取灵感:“几十年的交情让我能观察到职业对人的影响——比如一位当警察的同学,下班回家时就是个普通父亲,这种工作与生活的反差让人物更有层次。”他强调,创作写实题材必须拒绝“概念化”:“如果只写警察抓捕的一面,角色会很单薄;只有展现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,才能让观众感受到真实的力量。”

(下转第3版)